

左国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摇篮

□ 王永卫



昔日牧场今犹在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互补。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相激荡,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机勃勃、气象万千。而位于吕梁山西麓腹地的左国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特别是匈奴人刘渊在此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后,这里便成为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舞台。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长河中,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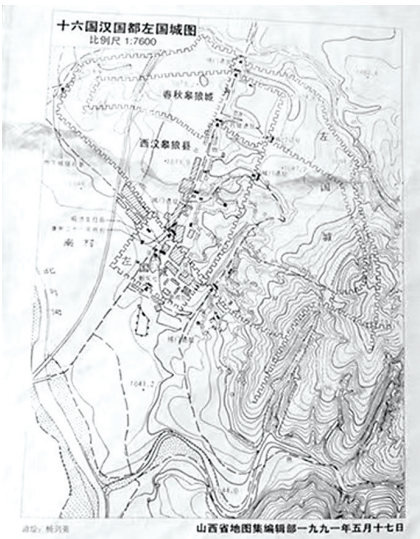
《晋书·载记》言:“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人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现属方山县)即单于所徙庭也。”南匈奴单于庭入驻左国城后,大量少数民族在离石周边地区定居,与汉族杂处。左国城上升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中心,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的核心基地。这些少数民族逐渐从游牧生活向定居农耕生活过渡。《晋书·王传》言:“魏氏居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即位,诏禁募客,胡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三国志·陈群子泰传》又载:“泰……正始中,徙游击将军,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怀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可知,内迁的匈奴部众,已逐渐转向农业经济,并且纷纷沦为田客和奴婢。左国城东靠黄土高原,北、西、南三面环水,古代这里北通岚代、南出平阳,向西可至陕北,往东可达太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背后的吕梁山沟谷,水草丰盈,更是游牧、狩猎民族的天堂,也是北方多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民族融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匈奴本是我国古代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其经济和社会生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逐水草而居,往来迁徙不定。《史记·匈奴列传》这样记载:“(匈奴)逐水草迁徙”“壮者食甘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妾之”。

长时期的游牧生活和不同于汉族的习俗信仰,使匈奴人勇猛剽悍,重武轻文,成为来去迅捷、势若狂飙的马上民族。而崇尚和谐相处,勤劳耕作,尊老爱幼,以法律和道德礼仪相规范即是我们汉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南匈奴内迁左国城后,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渔猎、采集生活方式,利用左国城背后骨脊山沟谷水草丰美的自然条件,繁殖牲畜,发展种族。从此,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襟带在这里得到碰撞,开启了民族交融的征途。社会结构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社会转化,实现了生活方式由游牧向农耕定居生活发展的历史飞跃。内迁的匈奴人对农耕致富和读书入仕的生活是越来越适应,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告别了朝不保夕的放牧生活,他们乐在其中。

汉族的商品经济和先进文化日益影响着匈奴人的生活习俗,双方逐渐消除了隔膜与族别界限,汉匈各民族之间的民间通婚也随之开始流行,呈现出一番“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



左国城地图

景象。这里作为南单于庭匈奴左部帅驻地,统领并督察匈奴五部军事。当时曹操把匈奴五部分布到石楼、汾阳、文水、忻州和祁县一带,其领导核心就在离石左国城。南匈奴统治集团在这里生活、开会、娱乐、研究内部事务、处理各种问题,协调五胡之间及胡汉之间关系。由于胡人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当时陕北、晋西北、晋东南的数十万胡人有了精神的依托,为少数民族混战和十六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西晋惠帝建武元年(304年),南匈奴首领刘渊根据当时天人环境,发动匈奴起义,很快推翻了西晋王朝,统治了山西大部分及长安、洛阳等中原的核心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内迁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的国家政权。

刘渊虽为匈奴人,但自幼居于汉地,酷爱读书,痴迷汉文化,曾拜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习中原的儒家经典和历史、军事著作,甚至可以“略皆诵之”“无不综览”,可见刘渊求学并非浅尝辄止,而是如饥似渴,学有所成。以至在日后与太原名儒王昶、王浑、王济的密切交往中,刘渊逐渐成为一个汉化程度相当深的匈奴人。刘渊七岁丧母“擗踊号叫”,孝悌之情感动四邻,令“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晋书》)。其孝亲至深的情感影响了周邻和宗族的匈奴人,使其逐渐将“贵壮健,贱老弱”的落后思想转变为以孝为德、为美的汉文明。正因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也专注于练习武艺。刘渊身材魁梧,身高八尺四寸,两臂奇长,善于射箭,力大过人。

刘渊这样的文韬武略,奠定了他未来作为匈奴五部首领问鼎中原的领袖地位。刘渊的母亲是汉朝皇帝刘邦宗室的女儿,也算是刘氏宗亲。后来刘渊也娶了一个汉家女儿张氏为妻,刘渊的第四个儿子昭武皇帝刘聪就是刘渊与张夫人所生。

匈奴通过通婚和对汉文化的接受,对民族融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其次,汉人通过掳掠、战俘、逃亡、投靠、和亲、出使(扣留)等途径外迁,进入匈奴,对匈奴政治、经济发展无疑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彼此也发生过为争夺生活资料、生存空间而引起的武装冲突,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和无辜牺牲,可各族人民之间有史以来即已存在的经济物资互为依托、风俗文化彼此交流的兄弟手足关系,不仅一刻也没有因之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呈现出日益密切的趋势。在政治结构方面,统治者仿效中原政治制度,以皇权和官僚系统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建公庙、筑城池,凭借强大的武力维护和扩张自己的版图。特别是自南匈奴内迁左国城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经济物资上互为依托,风俗文化上互相影响,有效促进了彼此的文化、生活乃至社会习俗的发展。

南匈奴内迁左国城后,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实现融合互补,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大融合,使其最终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南匈奴内迁后,随着匈奴骑兵数量的不断增加,从北方地区输入本地的马匹和有关马匹养殖、骑射的知识技术及经验至今影响着当地人。当时,匈奴人在左国城背后的骨脊山沟谷建立的“牧场”一直沿用到今天,也带动了当地养殖业的发展。

匈奴人在制造车辆方面有先创造诣,他们逐水草而迁徙,日常交通工具和军事运输就显得十分重要,匈奴人的生产生活几乎与交通工具紧密相联。汉人桓宽撰写的《盐铁论》卷六《散不足》篇说:“胡车(即匈奴车)相随而鸣。”

据《临县志》载:临县车赶村的名称来历与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建立汉政权后大造车辆有关。当时车赶村一带,森林茂密,匈奴人在这里砍伐树木用于制造车辆,故得“车赶”一名。可见匈奴人造车技术的历史和军事、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匈奴人有效地驯养了马,使大规模放牧牲畜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使依偎牛、羊、马、驼的习性和种类分群放牧成为游牧业的一大类型。



左国城出土的汉灰陶碗

匈奴人手工产品的种类也很多。畜产物、土、木、石、金属,特别是铁,无不成为他们加工的对象,并把他们的产品运用到他们生活、生产乃至交换等多个领域。匈奴的金属加工业也比较先进,在铁制品中有箭杆、箭、镞、马勒、斧、镑等。在铜(主要是青铜)制品中有鼎、壶、镜、铜戈、铜矛、铜锥、铜刀、短剑、剑把头、鹤咀斧、香炉、饰牌、马勒、车轴头、双耳锅、三脚灯台、战马护面具等。在畜产物的制品中,有毡、裘、靴、马辔、毛织品、骨簪等;木制品还有弓、矢、鞞、舆、鞍、木兽、木器、穹庐架。至于土、石制品如陶器、玛瑙兽、玉珠、佩饰物件、卮(酒器)等。对汉族人民的加工业起到了引领作用。

民族史学家陶克涛先生在《毡乡春秋——匈奴篇》中说:“他们既能建筑城郭楼屋,也能架桥设祠。”从左国城千年不倒的土城墙可以看出,匈奴的建筑业也蕴积着成熟的工艺。可以看出,匈奴的手工产品及其使用涉及生产领域、生活领域、交通领域、建筑领域等。匈奴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通过全面融合,消除了汉匈界限。

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通过融合互补,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各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进程。

当时,匈奴民族用武力征服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但却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并从中间吸收了汉族文化精华,更加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同时汉民族也从中吸收了匈奴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使自己的发展更为完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战争对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作用,尽管这不是战争的直接目的,但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

如刘渊起兵反晋的思想根源就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刘渊从小就崇尚汉文化,而且在汉文化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因此,作为人质在洛阳期间就受到当时曹魏的大臣司马昭的厚待。以后后来因为他的才能过人,被王浑推荐给当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看到他仪表非凡,谈吐举止得体,很是赏识他。后来他接替去世的父亲当了左部帅,因为才能出色,再后来晋武帝任命刘渊为北部都尉。

晋武帝死后西晋“八王之乱”,到处战争不断,晋朝日益衰落,已走到末期。刘渊见称王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在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建立政权,国号为汉,改元元熙。因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刘渊没有贸然称帝,而是效仿当年刘邦,权且称汉王,依照汉制设置百官。元熙五年(308年),刘渊羽翼渐丰,便正式称帝。刘渊是匈奴人,一心想着兴邦复业,可他为何要称汉皇帝呢?笔者认为,这就与汉匈民族融合和刘渊的人生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

刘渊深通历史,在他看来,自秦至晋,汉人政权虽有数个,但国祚长久的只有西汉和东汉,其余皆短命而亡,就连眼前的晋朝也是摇摇欲坠。刘渊认为“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定国号为汉,可使中原民心归附。刘渊称汉皇帝,据他说还合情合理,“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见《晋书》),汉匈既然约为兄弟,哥哥亡了,弟弟继承,这有什么不可呢?

刘渊称汉皇帝,不但“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见《晋书》),还以汉朝皇帝的后嗣来立国。同时还大量起用汉人中的名士担任要职,如他任用崔游为御史大夫,任命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为其子刘聪的太师。其后,刘渊兵锋直指西晋,并取得了系列军事大捷。随着刘渊影响的扩大,鲜卑陆逐延、氐酋单征、东莱王弥等其他反晋势力依附于其麾下,冀、徐、豫、兖等州的数万户流民也纷纷起来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刘渊。

刘渊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化的匈奴政权,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尽管其政权把中原推向战争和动乱,同时改变了曹操以来匈奴五部统治结构,重新恢复了匈奴传统旧制,但是为各民族之间深层次的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刘渊从左国城起兵,到其子刘聪攻打洛阳,将当时的天下第一繁华古都洛阳及周边千里变成一片废墟,所有珍宝及宫女都带回,史称“永嘉之乱”。造就了中原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后又追至长安,彻底将西晋灭亡。终于控制了整个中原,取代汉族成为中原正统。从此,中原大地进入了近三百年的“五胡乱华”时期……

五胡的内迁是在中原政府控制下进行的,而五胡的混战则是民族矛盾失控的悲剧。但站在历史的田埂上你就会看到,五胡的汉化就像冰雪融化成春水一样,其鲜活的生命之水漫过田垄地沿不断地注入中原民族生存发展的原野,这种活水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统方面的大融合,有力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活力。

刘渊后来被认为是“五胡乱华”的祸首,也是这个缘故。可以说,苻坚、元宏、宇文邕等十六国北朝英主正是在继续刘渊的未竟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短祚的汉国、偏僻的左国城、刘渊本人都无疑是具有永久影响的历史标志。而他所建汉国都城左国城却震撼中华大地,在民族融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羯人石勒的后赵、鲜卑慕容的燕、氐族苻坚的前秦、鲜卑拓跋的北魏,以及后来赫连勃勃的夏,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都与左国城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当时的左国城,在内迁胡人心目中成为中央政治集权圣地,其榜样的力量甚至鼓舞了后世的元蒙和清朝统治者。这一切,皆起于左国城这座北方民族文化融合的摇篮。

